

聊书

数学无处不在

张一曲

人们总以为刑法距离现实生活很远。其实,不远。你、我、他都有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比如,关于死亡。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刑法理论中采取的是医学上的标准。但有趣的是,在医学中,死亡分三档,第一档是脑死亡,第二档是临床死亡,最后是生物学死亡。这三档是个不可逆、渐进的过程。那么,究竟应该以哪一档作为死亡的标准呢?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你会仅以脑死亡标准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吗?这个问题尚无一定之规。本书作者罗翔从道德、法律、伦理、社会影响等多个角度对死亡涉及的问题逐一分析。分析后,他对此类争议通常会提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引发读者思考。

罗翔是政法大学刑法学老师,

也是一名新晋网红。作为老师,解释法条容易,若涉及法律事务,不仅要把干巴巴的法条解释清楚,还要结合多种社会复杂情况,这就考验一名网红是否真正接地气了。

书里的很多热点,如代孕是否合法的问题、性侵案中女性的合理反抗标准是多大程度、见义勇为的尺度如何把握等,都有作者的独特见解。

学法律的人,果真是人间清醒。



一提起数学,脑海里闪过的是不是难记的、枯燥的公式呢?但如果您能认真看完这本书,再次提起数学时,定会觉得数字也好、公式也罢,都会像天空中璀璨的星星一样熠熠生辉。

这本书的作者是国际知名数学史专家翁贝托·博塔兹尼。书的原名是意大利语,直译过来叫“宿命时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看完书我明白了,人类伟大的发现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力量,而是一连串的事件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然后突然成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书里面一个个小故事非常有趣,让人感叹:数学,真是无处不在。

《奥德赛》中机智的奥德修斯告诉独眼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没有

人”,透露了人们早就认识了虚无。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的画像,为数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自然界中,一朵花、一片叶子生长的形状,葵花子的排列方式,都跟无理数有关。

达·芬奇说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数学的发展也成就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不禁勾起我的好奇心,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弯曲空间、想象空间是什么样的?未来,又会出现哪些“宿命时刻”呢?



差阳错阻止了奥黛尔的自杀。通过二人的逐步交往,慢慢揭开了她离开巴黎的真正原因。

书中不时穿插着我们熟悉的莎士比亚、奥斯汀、勃朗特、海明威、狄更斯和卡夫卡等作家作品,是奥黛尔解决生活烦恼的良方。这就是书籍的力量吧。让我想起了《查令十字街84号》,书友之间是可以有心有灵犀一说的,好的书籍是可以穿越时空地与你相遇的。

唯书籍和爱不可辜负。



浸入文化缝隙的水

王海宁

负的战场。

《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的作者菲利普·鲍尔是一名英国科学家,取得了牛津大学化学专业学士学位和布里斯托物理学博士学位,是顶级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自然》的顾问编辑,著有十余部脍炙人口的科普读物。他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来中国做访问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中国文化有着浪漫的想象,走近之后,愈加着迷的同时也越发困惑。尽管距离马可·波罗描述中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700多年,即使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人,依旧庞大繁杂,古老甚至神秘。菲利普一直试图找到能够豁然开朗进入中国文化宝库的密钥,慢慢地他意识到即使他再花上几十年,也很难对中国文化做出一个概貌全面的描述。

最后菲利普还是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小切口的文化史研究。菲利普详细严谨地选取了水作为解读中国文化基因的编码单位。就像千变万化的水本身,“水”在历史不同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其中有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有些事实则得到别开生面的解读。菲利普笔下的中国文化里的水,就像游客相机里的高清照片——它与现实既相似又不同,既真实,又有全新角度的观照。我们在自己住惯的房子,常常觉得一切都自然而然,菲利普就像一位热心的访客,在认真了解你的偏好、品位、年龄、收入后,拍下了他认为有特色的无数局部照片,而这其中,我们也会重新发现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历史痕迹,我们忽视的好恶习惯。菲利普,用水带来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新颖“洞见”。

水运航道就是“高速公路”

尽管中外的古老传说中,都有“大洪水”,但是如何赋予统治者权威,水扮演的角色,却有着本质不同。

西方传说中诸亚舟的洪水,是对人类之恶的惩罚,只有善良的人才能逃脱——洪水神话鼓励的是尊重无上的权威,赋予幸存者道德的优越。在中国神话中,洪水本身是一种恶行,而“治水”之人,让狂暴的水安静下来,让混乱归为有序,免除人们的恐惧——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本身就是“权威而有德行”的人,治水者的形象如同结束社会动荡的统治者——“对大洪水的驯服代表了动荡时代对社会秩序的梦想”。治水者成为权威的贤明统治者最早的原型就是“大禹治水”。而后来神话不断发展,龙治水,龙是中华文明的图腾,更是有着权威的意味。

菲利普显然下了一番功夫,发现了许多遥远的呼应。他从《史记·秦本纪》“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的表述里意识到,这其中的“大费”即“伯翳”,是传说中禹的助手,后来“舜赐姓嬴氏”,这一支后裔后来成为诸侯,发展成秦国,而秦始皇是“嬴政”,统一了中国。这条记载,今天读来不过是遥远传说与历史的一次交融而已,但是菲利普指出,显然秦始皇认可这一传说,因为宣称自己就是“大费”的后人,将自己与高尚的先贤血脉相连,对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言而喻。今天读来无稽可考的传闻,当年却可能是王权正统性的一个重要佐证。

菲利普广泛了解了中国的神话、历史与民俗。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傣族的泼水节,从黄帝战蚩尤的特洛伊之战或者亚瑟王传奇。

请出旱神“魃”,到李冰修建都江堰,无论是远古神话还是封建官僚政治,漫长的历史中,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周期性的洪水与干旱,对于沿岸的百姓来说,是命运的劫难逃;而修建大型水利设施、开凿运河、造船出海这些举措都需要贤明的政治环境,有为开明的官员、繁盛的人口基础以及充裕的财政支持,因此对大江大河的正确治理总是与盛世紧密相连。

水将“道德行为”“水资源管理”“国家权力”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统一了起来。

当中国的帝王定都北方时,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北京,都需要将粮食从中原和江南运送到北方,陆路运输需要人力、畜力,成本极高,而水运粮食就成了更经济的选择。从汉代开始开凿的“漕渠”,形成了系统的漕粮运输系统,维系住了大汉江山。而长江的拉纤纤夫,这一苦不堪言的职业一直持续到民国。

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隋唐大运河,耗尽了隋朝的气数,却在接下来的数个王朝之中,形成了江南的运河城市繁华,成为连接中国江南和北方权力中心的大动脉。水运发达带来经济繁荣,沉淀了财富,也开风气之先,江南繁华的商业文化的发达,正是伴随水网运输的发达而逐渐形成。

水战有了新的戏剧外衣

中国历史上许多转折性的战役,是惊心动魄的水战。许多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比如三国的“草船借箭”“赤壁之战”,而这些在菲利普的叙事视野里重新有了荷马史诗的味道,“兵不厌诈”“人心向背”在菲利普看来如同一场在长江流域上演的特洛伊之战或者亚瑟王传奇。

《三国演义》章回体小说中的一章被西方化的语境描述过后,有了《权力的游戏》的味道,这也让人感慨古今中外的精彩文学作品,不论何种语言何种技巧,其故事的核心魅力总是相似——“忠诚”“背叛”“嫉妒”“贪婪”,以及戏剧化的悬念和转折。在讲故事的同时,菲利普还从科学史的角度,详尽地考证了中国造船的技术。

尽管逐鹿中原的陆地鏖战居多,但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划江而治的短暂分裂,长江又被视为战略上的天然屏障,所以大决战中水上战场总是成为关键砝码。菲利普在《水战》一章中解释,水战常常是酝酿长久的最后一役,或者走投无路的背水一战,这就像把一部漫长的纪录片中最具特色和戏剧张力的片段拣选出来精编之后,做成了一个新的“水战精选”,成为一个王朝更替的水上舞台。

水的特性,水的力量,水的魅力,如同细胞间质一般,活跃在中国文化的DNA里。政治家魏征谈起治国之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军事家孙子谈论军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文人说知音用“高山流水”,做人的境界是“水,利万物而不争”。关于水的隐喻,就像我们文化的水印,无处不在。

李白、杜甫都曾经在黄河长江沿岸漫游,而在中国诗词歌赋中,对水在中国大地上壮丽的景色一再吟咏,对水患肆虐的灾难叹息悲鸣不断。我们浸淫于此,身在其中——“鱼儿看不见水”,反而是旁观者,得到了我们未知的趣味。

中外文化中,都用水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菲利普如同逆流而上寻找源头的时间旅行者,梳理出一条中国历史文化浩荡而丰沛的全新脉络。

流动的画室

任海丁

《书画船边》是散论传统书画之书。以书画船为题,作者陆裕容用大块史实的边角料,侧写明清300年左右文人与书画的故事。

书画船,是文士旅行乘坐的用来进行诗文书画创作、会友鉴赏及后来书画做收藏交易的船。古时南方河道密集,多有这种雅船,它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末,待河运交通失去了重要性才逐渐消失。像米芾和董其昌的书画船,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后者的船简直就是一间“流动的画室”。应该说,书画船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中独特的现象,它对书画的鉴赏、创作的样态影响很大。学者傅申就认为,坐在舟中浏览两岸,画家的视线是不断移动的,这可能就是中国山水画手卷多视点的缘故或者说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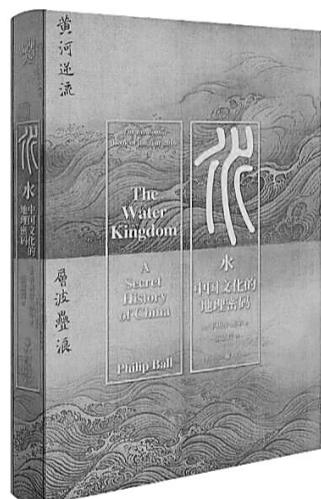
书写得漂亮,感怀微妙,然而未必仅仅是情思偶发,细细品味的话,书画船的比喻也似乎暗藏着一个有关文化记忆的积极再生观点。书中的章节安排也并非偶然。先是从清代两位较不出名的文人画家说起:戴以恒的故事讲了后世文人在继承的资源困境里雾里看花;而顾大昌的故事,则说苏州地方经历“洪杨之乱”后,仍艰难地坚持文人精神停留的形式——雅集,无论如何都要把消息留给有心人。随后作者立刻提起清代王时敏、王肇求证黄公望《秋山图》真迹而唯得困惑的传说、明清画家对元人“江干七树”画作图式不断尝试的固执顽念,勾勒出宋元文脉在明清之季传承的真实状态之一种。不得不说,其实它更像书中引王原祁所说“不知真虎如何,但以余意为之”的主观状态,说是对传统的某种想象,则也应可以。

纵使如此,作者用心却还要深。在《明清才女的理想形象》一章中,对于著名历史人物形象在传说中变化“失实”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却也因其丰富和模糊,反而化身为一种合用的‘套子’……即是所谓‘熟典’,可以送给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可以进入小说,为主角增光添彩”。再看书中貌似闲笔穿插着的实事挖掘——清初遗民王铎《枯兰复花图》、项圣谟《大树风号图》所隐含曲尽机锋,明清仿造书画作品猖獗的“鬼的春天”等各章,就会渐渐明白作者的未表之意。既然文人画迹的世代传递因现实不得已,总属缥缈,但或者只要建构出传递的坚实载体,念念必有回响也未可知。

这样的行为,类似回忆的“复调”——记忆发展的另一声部的旋律线,然后,它又与原声部的旋律紧密织就,成为一个整体的音乐织体表现——而回忆与过往事实也就同时成为一个。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学者齐格弗里德·施密特的研究指出:“个体之间互相期待的集体知识”将“引导着他们的认知过程,决定着何种东西被回忆或者叙述为‘过去’;并‘由此生成认知性的秩序’;而记忆,其实是以‘通过行动者对它的应用来实现自身’。对于明清文人,他们可能就是以这样‘复调式’的行动打造出一个关于传统的‘记忆之场’的。换句话说,这一记忆场构成了其时较为稳定的传统意象表征系统,遂而成为了传统的某种‘时间故乡’:在其中,一切都不曾失去,且还得到了构想性的、再造性的保存。

作者在《后记》中叹明清文人传统之渐远,自述著书之意是:“但读书阅画讲故事,是把船靠在岸边,看蒲深水寒星闪闪,听人歌人哭声声中。”其实亦不必太过伤感。身体力行的日常热忱经验和行动,是明清人对传统记忆的一叶舟。今日如有此念,心中持定,也可以有今人的记忆“书画船”吧。

作为文化推手的水



“水哉,水哉”,孔子曾经这样感叹。世界上最简单的化合物,化作江河湖海,便成了推动世界的源泉。水,既可是文明源头,也可是灾难忧患;滋润万物,也泛滥成灾;是运输交通的航道命脉,也是一决胜

回望中国商业的历史脉络

曲宏

价不低,深受百姓欢迎。李强从商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商业都市的发展、商品种类的变化以及货币的变化史,对中国商业发展进程和商业文化流变做了清晰的梳理。

本书以商业发展时间为轴的线性脉络,便于人们理解。商业与商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商朝之前,平等交易、等价交换的商业文化就深入人心。在夏朝时,它属下的小部落商族的首领王亥就驯化了牛,带领部落赶着牛羊到其他部落进行交易,给其他部落带去运输工具、夏朝的其他部落都喜欢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这在《山海经》中有所记载。商朝人以经商发家,自然重视商业,国君在宫城中修建“九市”。周朝时商业更是被当作国家的重要事务,商业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和林业差,“商贾”在当时的“九职”中位列第六。重商的文化孕育了重“义”的商人,他们无私支持国家,郑国“弦高犒师”的典故就是例证。古代商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从战国晚期到南北朝期间开始“重农抑商”。商鞅主张出台法令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刘邦也出台“贱商令”,不让商人骑马、坐车、经营高級服装。如果说秦时对商人是迫害与掠夺,到了汉朝就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到了唐宋时期,“抑商”局面才得以改观。唐朝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富商大贾“常与朝贵游”。到了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可以

为“商业文化”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中国商业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李强认为,要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史,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核心价值观,而“义利并兴”“候时转物”“以和为贵”和“诚实守信”,就是构成中国古代商业的核心价值观。

自古商人喜欢在店铺里挂两个条幅,上书:“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就是范蠡,端木就是子贡。范蠡当过越国的上将军,帮助越王“卧薪尝胆”,成为一方霸主后,他及时隐退,成为商人。在商而不溺于商,求利却不蝇营于利,范蠡才是真正知晓“上商近道”的人。子贡复姓端木,本是卫国普通商人,可他成为孔子学生后,追随孔子“问仁”“求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成为后世商人的楷模。这样的从商之道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为阻挡秦军偷袭郑国而献出自己的牛羊;汉武帝时期真诫无私的商人卜式,为支持攻打匈奴而捐出一半家产。此外,还有对唐朝的小商人察义创业史的叙述,从13岁卖掉亲戚给他的双亲开始,用了十几年时间,历尽辛苦,成功打入京城富商行列,发财后不忘接济穷朋友。这些历史上的著名商人共同开辟和延续了中国的“义商风尚”,取舍之道影响深远。以尽可能大众化的方式,以当下的视角,将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做了通俗表达,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诗词书简里的商业气息

商业文化由来已久。但李强认

地流露出当时的商业气息,从文化名人的诗词书简中可以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商业烟气。通过“笑入胡姬酒肆中”,我们了解到当时长安城内有许多西域商人做生意,通过“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驯”了解唐朝酒馆也可提供葡萄酒,用金制的酒器,当时珍贵的葡萄已进入百姓生活。欧阳修的书简则另有一番意趣,他给友人送鱼干“尝鲜”,送数十乃至上百管毛笔,还谦称“起草可也”。好友送来珍贵的茶叶,他要还回去一半,一方面反映了宋朝的茶叶市场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精英人物的消费品位。在这些“文化人”的字里行间,早已消逝的商业“烟火气”和文化韵味仿佛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